

宣佈國民黨「死亡」

一、參加孫中山的奉安大典

一九二九年四月，宋慶齡從德國經蘇聯回國，參加將要舉行的孫中山的國葬儀式。

中山陵是我國自己設計施工的陵園建築，其規模之宏偉，世界罕見。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宋慶齡與孫科等人遵照孫中山生前願望，到南京勘察孫中山墓址，選定鐘山第二峰茅山南麓為陵墓地址。鐘山是南京近郊最大的山，主峰海拔約四百六十八米，總面積約四十五平方公里。因山岩呈紫金色，所以又稱紫金山。此山峰巒起伏，蜿蜒如龍，有「鐘山龍蟠之勢」。這裡風景優美，名勝古跡很多。

宋慶齡等選定的中山陵墓址，適位於紫金山的正中。墓地範圍劃定後，從應徵的四十餘份陵墓圖案中，選定用呂彥直設計的圖案。中山陵的總平面圖為木鐸形，鐸是類似鐘一類的樂器，是我國古代帝王宣佈政教法令時所使用。中山陵取此圖案，表示「天下皆達道」之義，即全國人民都走孫中山指引的革命大道。圖案決定後，聘呂彥直為建築師主持設計中山陵建築群的詳圖及施工事務（呂彥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少年英俊，富有才華，又刻苦勤奮，

精心鑽研業務。他為設計中山陵圖樣廢寢忘食，嘔心瀝血，以致積勞成疾，在工程尚未完成時就逝世了，終年才三十餘歲。陵墓於一九二六年六月一日開工。在這以前，三月十二日，宋慶齡到紫金山施工現場參加了奠基禮。

中山陵依山建築，坐北朝南，面積約八萬多平方米，全部用花崗石和鋼筋混凝土等建築材料築成。主要建築有牌坊、墓道、陵門、碑亭、祭堂和墓室等，都在一條中軸線上。牌坊中門橫額的正中，立有一石匾，上刻孫中山手書「博愛」兩字，故稱「博愛坊」。中間陵門的石額上刻孫中山手書「天下為公」四字。祭堂是一座仿古木結構宮殿式的建築，正面入口共三處，都是石拱門，門楣上分刻「民族」、「民權」、「民生」陽篆。正面上下簷之間，嵌孫中山手書「天地正氣」四字的直額。四壁上半部貼人造石，下半部護壁嵌黑大理石，東西兩邊分刻孫中山手書的《建國大綱》。後壁接通墓室。祭堂正中為孫中山穿長袍馬褂的石雕全身坐像，體高約四點六米。像座四周浮雕孫中山革命活動事蹟。墓室中央是方形墓穴，下面安葬孫中山的遺體，上放孫中山穿中山裝的大理石臥像。墓室與祭堂通連處朝南有兩道門：內門楣上刻有「孫中山先生之墓」七字；外門是精緻的銅門，門外用黑色大理石砌成外框，門額上刻孫中山手書「浩氣長存」四字。

整個設計頗具匠心，體現了孫中山的革命精神，佈局和造型表現了我國古代陵墓傳統的民族形式，而在結構、用材和建築技術上吸取了當代的成果。

綜觀中山陵，三面叢林，北面是高山峻嶺，南面是開闊的平原，陵墓由下至上，順著山

坡的起伏，用長距離的墓道、寬敞的廣場，大片的綠地和平緩的臺階，把各種類型的單體建築連結在一起，組成一個規模巨大、莊嚴而宏偉的建築群。像這樣紀念性的建築，國內國外都不太多，在我國建築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南京政府決定大張旗鼓地以最隆重的儀式對孫中山進行國葬，這一方面是民心所向，另一方面則是蔣介石集團想以此大撈政治資本，並乘機對宋慶齡做爭取工作。為此，

他們在三月二十六日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在宋慶齡沒有出席的情況下仍選她為中央委員，並委派宋子安赴德國迎接她回國參加孫中山的奉安大典（宋子安後未成行，只到了瀋陽迎接）。

宋慶齡又面臨一個嚴重的挑戰：要不要出席奉安大典？如果出席，採取什麼態度？特別是怎樣對待既是政敵又是妹夫的蔣介石？

宋慶齡從容地接受了挑戰。由於對孫



一九二九年五月，宋慶齡和兒媳陳淑英在北京碧雲寺參加孫中山移靈南京的國葬儀式。

中山的無限深情，她當然要回國參加國葬典禮，但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決不妥協讓步，決不給他們可乘之機。她在起程回國前，就發表了《關於不參與國民黨任何工作的聲明》，把國民黨反動派的如意算盤徹底打亂了。聲明說她此次回國純粹是為了參加將孫逸仙博士的遺體移至紫金山的儀式，「為了避免任何可能產生的誤解，我不得不申明，我堅持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在漢口發表的聲明，在那個聲明中我宣佈不再參加國民黨的工作，因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政策和活動是反革命的」；「因此必須十分明確，我參加葬禮決不是、也決不能被解釋為我要緩和或改變我的決定：在國民黨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孫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則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該黨的任何工作」。聲明最後重申孫中山學說的基本原則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與蘇聯密切合作，實現工農政策。¹³³

這麼旗幟鮮明，這麼簡明扼要，不容有任何曲解和商量的餘地，這對國民黨反動派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宋慶齡四月底啟程回國，為防止國民黨封鎖她的《聲明》，在五月十六日抵達哈爾濱時，她又發表了幾個內容相似的聲明，表現了她鬥爭的堅韌性。

五月十七日，宋慶齡抵達瀋陽，張學良派夫人于鳳至到車站迎接，並在張的私邸會見張學良。宋家與張學良的關係是很親密的。由於張學良早年充滿傳奇色彩的經歷，二十餘歲即

已名滿全國，功業鼎盛，引起宋家的關注。特別是宋老夫人和宋慶齡、宋子文及宋美齡，對張學良有特殊的感情，張學良也對宋家十分敬重。

宋慶齡當晚就離瀋陽赴北京，參加孫中山的遷葬活動。

在迎靈、護靈、家祭、封棺、國葬等一系列儀式中，蔣介石

以黨政首領及孫中山親屬的身分，與宋慶齡一起參加，但由於宋慶齡有了以上聲明，她就能光明磊落、大方有禮地應付一切場面，而把自己的一切情感傾注在對孫中山的哀思上面。

五月十八日，宋慶齡率領孫科、宋子良、宋子安以及國民黨政府的迎櫬專員林森、吳鐵成和鄭洪年的遷葬行列到達北京。當時到前門車站參加群眾迎接的費彝民回憶說：他親眼看到宋慶齡穿著黑色長旗袍，從專車走下月臺。遙望宋慶齡的風采，「只覺秀慧之氣、剛強之志，溢於言表，完全一派巾幗丈夫的風範」。¹³⁴



宋慶齡在南京浦口迎接孫中山靈柩。

想起孫中山逝世才四年多，中國革命和他首創的國民黨竟被糟蹋到這等地步，宋慶齡到碧雲寺時已悲痛得不能移步，下車後由左右攙扶而上，護靈處副官馬湘在前導引，並報告迎接布置情形。宋慶齡到靈堂前行禮獻花圈，然後手指靈櫬，意思是再看看孫中山的遺容，衛士揭開覆蓋在棺槨上的國旗，扶她上石台。她邊走邊說：「總理，我在此地，你往哪裡去了！」她容儀黯淡，「左右請扶夫人下，夫人不忍，撫棺大號，淚珠滴於玻璃蓋上，與四年前親視含殮時同一悲哀」。¹³⁵

六月一日，宋慶齡又親自護靈到南京中山陵，一步步走上幾百級臺階，把孫中山的靈柩送進墓室。孫中山的遺體放在一隻精緻的紫銅棺內，棺下面有一個特製的楠木座子，棺上還有一層密封著的水晶透明板，站在石壇上扶著欄杆就可以瞻仰孫中山的遺容。公祭後，將紫銅棺蓋上，然後由宋慶齡親手將墓門「敬謹嚴局」。後來，又在墓室中置放了孫中山的一座石雕臥像，供人們永久瞻仰。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政府西遷，曾計畫將孫中山遺體遷走。由於護靈工作人員藉口墓穴密封堅固，難以打開，一個工程師又阻止說，如用爆破辦法不僅墓穴毀壞，遺體也難保無損，結果才沒有移動。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撤離南京後，海內外一度謠傳孫中山的遺體也被遷往臺灣，並在臺灣重建了中山紀念堂。事實並非如此。孫中山的遺體一直

在中山陵。一九八六年八月，據有關部門用現代化先進儀器測定，孫中山的遺體比原來縮短了一寸左右，其他一切完好。¹³⁶

二、舌戰戴季陶

孫中山奉安大典完畢後，宋慶齡第二天清晨即返回上海。當時，上海各報紙及通訊社記者紛紛就政見問題登門採訪，宋慶齡派秘書代為答覆說：「對政治無任何意見發表。」¹³⁷

蔣介石企圖籠絡宋慶齡的工作一直抓緊進行。他們為宋慶齡在南京安排了高級住宅，擁有豪華舒適的全套設備。然後，六月九日，宋美齡專程由南京到上海，敦促她二姐赴南京參加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遭到宋慶齡的斷然拒絕。¹³⁸

當時，有的人以為宋慶齡會在上海隱居下來，對政治局勢保持沉默。這也是國民黨當權



二十世紀二〇年代的宋慶齡。

136 《文匯報》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三日。

137 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九年六月三日。

138 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九年六月十日。

者在爭取她與他們合作不成而求其次的情況下所期望的。但是，宋慶齡並不隱居，也決不沉默，而是準備著進行公開的鬥爭。

一九二九年七月，蔣介石、張學良指使中東路中方負責人以武力接收中東路，逮捕和驅逐蘇方工作人員，同時調東北軍沿蘇聯國境佈防，準備挑起對蘇戰爭，製造了中東路事件。中國共產黨強烈譴責南京政府的反蘇行徑，並號召工、農、兵、學、商各界人民群眾在八月一日「國際反戰日」舉行遊行示威，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反蘇挑釁和戰爭陰謀。各地群眾積極回應，在八月一日這一天，上海等各大中城市開展了廣泛的鬥爭。

宋慶齡參加了這一場鬥爭。八月一日，她在寓所親自擬發電報給柏林的反帝大同盟，強烈譴責國民黨反動派對內屠殺工農，對外親帝反蘇的罪行，指出「反革命的國民黨領導人背信棄義的本質，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無恥地暴露於世人面前。在背叛國民革命後，他們已不可避免地墮落為帝國主義的工具」。她向全世界表示：中國人民「不因受鎮壓而氣餒，不為謊言宣傳所矇騙，他們將站在革命一邊進行鬥爭」。統治者的恐怖行動「只能喚起更廣大的人民群眾，加強我們戰勝目前殘忍的反動派的決心」。¹³⁹

這份電報，是宋慶齡歸國後第一次，也是近兩年中對國民黨反動派最尖銳、最激烈的一次抨擊。而且，它被印成中文傳單，於八月一日「國際反戰日」，在上海共產黨組織的群眾示

139 [美]艾蜜莉·哈恩：《宋氏姊妹》第一百七十四、一百七十五頁，香港一九四一年英文版。

威中廣泛散發。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鎮壓，逮捕散發傳單的人，並向宋慶齡進行威脅。宋慶齡毫不屈服，她向友人表示：「我發了那份電報後，心裡舒坦了……至於我個人因此有什麼遭遇，那是無關緊要的。」¹⁴⁰

宋慶齡的勇敢行動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蔣介石的謀士戴季陶便散佈謠言進行攻擊，他胡說電報是「共產黨的捏造」，其險惡用心是給宋慶齡羅織「通共」的罪名，從而將她投入監獄甚至處決。宋慶齡對這種卑劣的謊言立即作出強烈的反應，當面斥責戴季陶「捏造不免太憤憤了。我有權可以證明，一字一句都是出於我自己的」。¹⁴¹

這種有力的斥責，是在八月十日戴季陶偕其夫人到莫里哀路寓所拜訪宋慶齡時進行的，是蔣介石在宋美齡碰壁而歸後仍不死心，又特派戴季陶再次前往說服得到的回答。戴季陶首先以自己襄助蔣介石進行「國家的建設工作」、「分擔一份黨國艱難事業的責任」的感受，妄圖說服宋慶齡到南京去，以「就近向政府有些貢獻」。美國諺云「狐狸說教意在偷雞」。宋慶齡深知戴季陶醉翁之意，當即斷然拒絕說：「我對於政客的生活不適合，況且我在上海都沒有言論自由，難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嗎？」

於是，戴季陶惱羞成怒，用不准發表致反帝大同盟一類電稿進行威脅說：「我真不大相

140 (美)艾蜜莉·哈恩：《宋氏姊妹》第一百七十四、一百七十五頁，香港一九四一年英文版。

141 宋慶齡：《痛斥戴季陶》，載《宋慶齡選集》第四十三至四十九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以下所有引語，均出於《痛斥戴季陶》一文，不再一一注明。

信，像您這種地位，取這種態度，實在是有點不可思議。這誠然是一樁很嚴重的事啊！」宋慶齡義正詞嚴地駁斥說：「我是代表被壓迫的中國民眾說話……我的電報正是中國人的光榮的表示。你們投降日本和外國帝國主義，侮辱革命的蘇俄，才證明你們都是一夥走狗，而有玷於國家與人民……你們對於中國革命的歷史，留下了多少的玷辱，民眾將有一日要和你們算帳啊！」

戴季陶在被宋慶齡駁斥得無言答對後，就軟硬兼施。他先裝出一副悲天憫人的樣子，用所謂「良心」、「感情」之類進行軟化，要宋慶齡諒解政府的困難，並說「你必定明白的，三民主義不能憑空在幾年之內便能夠成功的，它需要三百年或者四百年，誰又能斷定呢？」又要她留心政府的「進步」和「建設」，說「任何人都有良心的……介石正在極端努力以謀求實現孫先生的建國大綱，他負著極大的責任，前途要超過無窮的阻礙，全體忠實同志，都應該來輔助他」。甚至還說：「你不能夠到南京來一遊嗎？那裡有你的親族，在那樣的環境裡面，你也會比較得快活一些。我們同是人類，而且還是富於感情的人類呢。」

宋慶齡嚴正地回答說，「我寧可同情於民眾」，南京是一個「痛苦的環境」；說三民主義需要三四百年才能成功，那是「你們改篡過了的三民主義。孫先生自己曾聲言過，假如黨員能夠確守主義，革命是能夠在二三十年之內便可以成功的」。關於政府的「進步」和「建設」，她說：「我覺得除了看見你們妄肆屠殺幾十萬將來可以代替腐敗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沒有什麼了，除了窮苦絕望的人民以外，沒有什麼了；除了軍閥爭權自私自利的戰爭以外，沒有

什麼了；除了橫徵暴斂苛取於民以外，沒有什麼了。老實說，你們什麼都沒有，只有反革命的活動罷了。」

接著，戴季陶又以所謂黨的「紀律」來約束宋慶齡。他說：「縱使政府有了錯誤，你也沒有權利公然地說話。你應該遵守黨的紀律」；「你必須服從大多數人的意見」；「請你不要枉費精力於這種破壞方面，來攻擊政府和幾個領袖，須要與我們合作才是你的義務。」

宋慶齡理直氣壯地譏諷說：「遵守黨紀，雖然，謝謝你們把我的名字列上你們中央執行委員會，其實我並不屬於你們的貴黨。你竟有這種勇氣告訴我，說我是沒有權利說話。你們可是把我當作招牌去欺騙公眾嗎？你的蓄意正是一種侮辱。」

戴季陶軟硬兼施的進攻都毫無結果，最後就圖窮匕見，氣急敗壞地威脅說：「我希望你不要再發表宣言。」

從這裡可以看到，宋慶齡兩年來發表的一系列宣言和聲明，雖然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百般封鎖，仍然發揮了巨大的威力，使反動派聞之喪膽。所以能發生這麼大的作用，一方面固然由於宋慶齡的特殊地位所決定，但也與她高超的外文才能，以及利用個人的國際關係、外文刊物等條件直接有關。這是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的。

解放後，一九五一年六月，宋慶齡在出版《為新中國奮鬥》一書時說，從一九二七年七月到新中國成立前後，她寫了大量文章，多數發表在國際友人在中國辦的英文刊物和外國報刊上，不少還以外國讀者為物件，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我站在中國人民一方面，因此我

向廣大群眾說話的一切途徑都被封閉起來了。出版和廣播都完全操縱在反動派的手裡。他們不是壓制我的言論就是歪曲和曲解我的意思。」¹⁴²。

宋慶齡面臨戴季陶嚴重的威脅決不屈服，她斬釘截鐵地說：「使我不說話的唯一辦法，只有槍斃我，或者監禁我，假如不然，這簡直就是你們承認了你們所受的指責並不冤枉。」

在這場面對面的唇槍舌戰中，宋慶齡始終掌握主動，再次表現出她「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崇高氣節和敏捷的思辨能力。而被稱為國民黨中著名的「理論家」的戴季陶，儘管巧舌如簧，強詞奪理，最後卻被逼得理屈詞窮，狼狽敗退，只得悻悻地說：「我南京回來以後，再來看你吧。」宋慶齡則毫不留情地回答：「再來談話也是沒有用的了，我們彼此之間的鴻溝相差得太遠了啊！」

三、對國民黨的絕望與思索

從《關於不參與國民黨任何工作的聲明》、《致反帝大同盟》電報和痛斥戴季陶看，隨著國民黨南京政府地位的加強和對宋慶齡籠絡工作的加緊，宋慶齡對這個政權的痛恨也在日益加深，因而更為激烈反對這個政權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宋慶齡在思想上開始發生了重大變化：她不再單純地站在國民黨左派立場上，為挽救國民黨的墮落而鬥爭了。

142 宋慶齡：《〈為新中國奮鬥〉序言》，載《宋慶齡選集》第二百七十五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促使她在思想上發生這個重大變化，主要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經過兩年來的鬥爭實踐，她深深體會到，雖然進行了艱苦的鬥爭和很大的努力，但由於國民黨左派有組織的力量太薄弱，單依靠這個力量難以與反動派較量，這樣也就不可能再恢復國民黨的革命精神，因此她對國民黨越來越失望，正如她在與戴季陶談話中所說，「現在的國民黨是已經完全失去了它的革命的意義」；另一方面是，她進一步深刻地體會到孫中山晚年經驗的無比可貴與正確，即再好的理論和救國方案，如果離開了工農群眾及其先鋒隊共產黨的奮鬥，都將成為泡影。而現在，革命的工農群眾和共產黨正遭受法西斯白色恐怖的摧殘，因此，她就更加同情工農民眾，同情中國共產黨。宋慶齡完全看清在國共兩黨之間，在統治者與工農民眾之間的你死我活鬥爭中，已經沒有所謂既反蔣、又離共的「第三黨」的地位，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因此，她把希望寄託在共產黨身上，不再單純地以國民黨左派的身分說話，不再從事於挽救國民黨的活動。從此，她譴責的已不再局限於幾個國民黨反動派的頭目，並對與鄧演達在莫斯科共同發起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也持保留態度，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中，要為全中國人民大眾的利益而奮鬥。這是她思想上的一次飛躍。

宋慶齡的思想，也是當時國民黨左派人士中較為普遍的心情和動向。曾對蔣、汪集團寄予過幻想的何香凝也處在這個轉變過程中。何香凝自述說：「我覺得與那些當權的反動派鬥爭無效，這幾年來精神上痛苦不堪。」於是，她終於拍案而起，堅決譴責國民黨反動派的反蘇反共行徑，明確地說：「你們這樣反蘇反共，我要辭去國民黨內一切的職務，我要繼續與

共產黨、蘇聯人來往，國民黨的法律不能制裁我，我是遵守總理的遺言。」她不願再與反動派為伍，要「摒棄一切職守。嗣後，寧以畫筆棲遲，維持清苦的生活，不願同流合污，作國家民族的罪人」。¹⁴³

大革命失敗時武漢中央軍校左派學生和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幹事胡蘭畦，¹⁴⁴在隨同何香凝、鄧演達奮鬥兩年後，流亡到了德國，她在向廖承志要求加入共產黨時也深刻地認識到：「國民黨左派雖想幹幾件好事，但他們既無得力幹部，又脫離廣大工農群眾，在強大的反革命勢力面前，他們缺乏抗拒的力量和勇氣，甚至動搖妥協，因此，他們擔負不起革命的重任。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只有代表工農根本利益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才能真正擔負中國革命的使命。我要革命，要徹底推翻舊制度，就應該加入中國共產黨。」¹⁴⁵

宋慶齡雖然還沒有到要加入共產黨的地步，但她的心情與胡蘭畦是相同的。因此，她在莫斯科時就與共產國際建立了聯繫，歸國後還通過自己寓所中的秘密電臺保持這種聯繫。在租界中設置秘密電臺，是革命者利用半殖民地國家中錯綜複雜的矛盾，為革命事業服務的一個重要措施。宋慶齡在與戴季陶的談話中，譴責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向法國巡捕房控告她家裝置秘密電臺時，並沒有否認家中有電臺的事實。

143 何香凝：《自傳初稿》，載《雙清文集》下卷，第二百零六、二百〇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144 胡蘭畦當時還擔任過國民黨漢口市特別黨部婦女部長，武漢總工會女工運動委員會主任。

145 《胡蘭畦回憶錄》第二二十六頁，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宋慶齡為料理委託法國某公司製造孫中山銅像等事，離開上海乘法國輪船「士勞斯」號赴法。原來，在孫中山奉安大典後，中國曾寄一張孫中山的照片到法國某藝術公司製作銅像，費用共十萬元，已先付給兩萬元；由於從駐法代表來電得悉，銅像與照片略有走形，所以宋慶齡決定親自去處理。不料她這次出國，竟在歐洲耽擱了兩年。她在這一期間主要是住在柏林。

宋慶齡在柏林期間，潛心地研究孫中山的遺著，常常整日「沉湎書籍之中」；¹⁴⁶同時，又密切地關注國際國內的形勢發展，盡力從事革命工作。她每天總是早早起床，然後親自到郵局所租用的信箱裡取回書信和報紙（她的住處一般保密）。宋慶齡熟悉英、法、德及拉丁等多種外語，因此她訂閱好幾個國家的進步報紙，以便瞭解各國革命的動向。

當時已參加共產黨的廖承志受德國共產黨領導，在德國最大的港口城市漢堡讀書，並受黨的派遣擔任國際海員俱樂部支部書記，曾領導中國海員罷工取得勝利。一九三〇年六月，何香凝為辦仲愷農工學校籌款出國賣畫，由廖承志陪同到了柏林，並在那裡住了三個月。宋慶齡得以同最親密的戰友在異國相會，非常高興。她陪何香凝參觀德國博物館，遊覽柏林的名勝古跡，並經常到何香凝的寓所看望，兩人一起熱情地談論中國革命的前途和有關的各方面的問題。尤其使她們高興的是有時一同到柏林的日本料理館吃日本料理，共同回憶在日本

從事革命活動的艱難歲月。有一天，何香凝談到興頭上，就揮毫潑墨作了一幅《菊石圖》，並題詩一首：

惟菊與石，品質高潔；
惟石與菊，天生硬骨。
悠悠清泉，娟娟皓月；
惟菊與石，品質高潔。

這幅畫和詩，既是作者自勉，又是對宋慶齡高潔品格和堅毅精神的讚頌，同時也謳歌了她們兩人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誼。

在與何香凝相處的日子裡，宋慶齡認識了與何香凝住同一公寓、剛剛入黨的共產黨員胡蘭畦。何香凝離開德國後，受她委託，宋慶齡十分關懷胡蘭畦，兩人往來密切，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她知道胡蘭畦的經濟比較困難，就每週都買一些雞、魚、肉、菜到胡蘭畦的寓所做一頓中國飯吃。胡蘭畦回憶說：「她拿來的東西，幾乎夠我一個星期的需要。這是她有意幫助我，給我解決生活困難的一種巧妙辦法，我非常感謝她！」¹⁴⁷胡蘭畦十分敬重宋慶齡，認

為「她生活嚴肅，待人和藹可親，對朋友肝膽相照」。¹⁴⁸

兩次寓居柏林，使宋慶齡終生難忘。後來，她對德國友人王安娜經常談到，柏林的生活「是她一生中充滿愉快回憶的一段時期」；在這裡，她進修德文，喜歡聽德國民歌和吃用馬鈴薯做的薄餅。¹⁴⁹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宋慶齡母親倪珪貞病逝於青島別墅。宋慶齡在回國奔喪時，邀胡蘭畦陪她同行，並答應幫助解決她求學或工作問題，甚至可以資助她重回德國求學。經胡蘭畦所在組織「德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批准後，胡蘭畦便作為宋慶齡的秘書陪同她一起啟程。這樣，宋慶齡第一次與一個共產黨員朝夕相處一個多月之久。雖然，她當時並不知道胡蘭畦的政治身分。

宋慶齡回國經過莫斯科時，受到了蘇聯政府派來的外交部官員及加侖夫婦的歡迎。在賓館稍事休息時，她與蘇聯領導人舉行了秘密會談。¹⁵⁰會談內容雖然至今沒有資料可查，但是從宋慶齡回國後與蘇聯及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密切配合進行的一系列革命活動來看，顯然，這次會談對雙方以後的聯絡及合作作了某種安排，共同目標則是為了推進中國革命。這也是宋慶齡一九二七年訪問莫斯科時所期望以及史達林當時接見時所許諾的。

148 胡蘭畦：《難忘的記憶》，未刊稿。在宋慶齡與蘇聯領導人會談時，安排胡蘭畦觀光莫斯科。

149 王安娜：《中國——我的第二故鄉》第一百七十頁，三聯書店一九八〇年版。

150 胡蘭畦：《難忘的記憶》，未刊稿。在宋慶齡與蘇聯領導人會談時，安排胡蘭畦觀光莫斯科。

不過，當時蘇聯及共產國際求助於宋慶齡的要比給予的多。在宋慶齡動身回國前一個月，即六月十五日，共產國際遠東局領導人兼國際駐上海情報站負責人牛蘭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後來當宋慶齡一回國，以記者身分在中國活動的共產國際成員史沫特萊就立即上門，請求她與蘇聯紅軍總參情報部上海站哈爾德·左爾格主持的秘密營救牛蘭的行動相配合，主持公開營救的活動。宋慶齡一口答應，並盡力而為，顯然這不是偶然的。

當晚，她們離開莫斯科，列車繼續東行。看到西伯利亞一片荒涼和貧困，胡蘭畦十分驚訝！宋慶齡說：「你如果見過過去的俄國，再同今天比一比，現在就算在進步，在好轉哩！」車過貝加爾湖時，宋慶齡對胡蘭畦說：「當年蘇武牧羊就在這裡。」說時，臉上露出對這位西漢大臣囚居匈奴一九年持節不屈的民族精神無限崇敬的神情。黎明時刻，列車駛向滿洲里。宋慶齡激動起來，對胡蘭畦說：「快到中國啦！看山光水色已不同了，這些山川多秀麗啊！」熱愛祖國的赤子之心，深深地感染了周圍的旅客。

八月十八日，宋慶齡在上海參加母親的葬禮。蔣介石又一次得到顯示他與宋慶齡是親屬關係的機會。他現在已經完全成了馬克思筆下那種路易·波拿巴式的人物，即「一個不是晚上作出決定，白天行動的人，而是白天作出決定晚上行動的人」（即專搞陰謀詭計），一個十惡不赦的獨裁者、劊子手。他推行極端恐怖的法西斯專政，殘酷殺害革命志士，而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卻採取不抵抗政策。因此，宋慶齡對他們的憎恨和譴責更加升級了，最終導致她退出國民黨，宣佈國民黨「死亡」。促使宋慶齡採取這一斷然行動的導火線，是鄧演達慘遭

殺害的事件。

四、營救鄧演達

黃琪翔在一九二九年隨宋慶齡回國後，就在鄧演達的指導下，積極與那些大革命失敗後不願追隨蔣、汪集團的國民黨左派，以及從共產黨中游離出來的重要人物譚平山、季方、章伯鈞、肖炳章等人聯絡，並積極籌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籌備工作有了相當進展，於是他們即發函催促鄧演達回國領導，以便早日開展推翻蔣介石反動統治的鬥爭。

一九三〇年春，鄧演達回國。經與上海的同志多次商討研究，他起草了綱領性的檔《政治主張》。八月九日，借用上海黎錦暉住宅召開了十個省區代表參加的幹部會議，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央機構設在上海；通過《政治主張》，創辦《革命行動》月刊，並推選出「中央幹事會」。鄧演達被推為總幹事。隨後在全國十四個省市建立了組織。他們的主要矛盾是反對蔣介石的法西斯統治，同時也不同意共產黨的政治綱領，企圖建立第三種政治勢力，尋找第三條道路，實際上是幻想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因此被人們稱為「第三黨」。

「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打算爭取宋慶齡參加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個黨是一九二七年她和鄧演達、陳友仁在蘇聯時共同發起的。但是，現在的情況有了變化，宋慶齡對於挽救國民黨，把國民黨的旗幟從反動派的手裡奪過來，已經失去信心。宋慶齡的這個思想轉變，雖然與蘇聯、共產國際及中國共產黨不再推行「國共合作」政策、不再支持「國民

黨左派」有關。此外，也與「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在軍事上脫離工農群眾，重複了孫中山往昔依靠軍閥反對軍閥的老路有關。雖然他們口頭上宣稱要建立農工為中心的平民政權，卻主要依靠的是廣東軍閥。宋慶齡深知這是走不通的死路。所以，她儘管與鄧演達等人深厚的友誼一如既往，卻拒絕加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宋慶齡在回答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訪問時，明確表示自己不是「第三黨」的成員。¹⁵¹

宋慶齡的另一個戰友陳友仁，此時已與孫科、汪精衛、胡漢民、張發奎等人搞在一起，組織廣州政府進行反蔣活動。他們電邀宋慶齡加入廣州政府。宋慶齡不屑與他們為伍，明確地說：「我不願意參加任何一個政府。」¹⁵²她認為廣州政府與南京政府是一丘之貉，只是「私人政見」之爭。¹⁵³當時南京政府因廣州政府反蔣甚為激烈，加以「圍剿」紅軍接連失利，就想利用宋慶齡與陳友仁及廣州政府的關係，請宋慶齡做雙方的調解人，進行「和平運動」。他們甚至利用蔣介石與宋慶齡一起參加宋母葬禮的機會，在國民黨報紙上造謠，說什麼：「宋女士回國以後，目擊黨內各同志因故分離，痛心萬分，兼之全國遍地匪患水災，又為疾首，遂於蔣總司令日前來滬執紼時會晤詳談一切，現宋女士擬出面斡旋京粵兩局，以期一致對內對

151 《與史沫特萊的談話》，《宋慶齡選集》第五十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152 同上。

153 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九日。

外。」¹⁵⁴宋慶齡對此怒不可遏，於八月二十三日發表闢謠聲明說：「慶齡此次因母喪回國，暫時擬留滬休養，外傳和平運動，絕未參預。」¹⁵⁵

宋慶齡是孫中山三大政策最忠誠的繼承者，是堅決地站在共產黨和人民一邊的。她在這一原則問題上，不論在任何時候，對待任何人，都不會讓步。不管是蔣介石、汪精衛這些孫中山生前很器重，現在又很有權勢的人，還是自己的姐妹，或是像鄧演達、陳友仁這樣患難相交的親密戰友，都是如此。

宋慶齡雖然沒有參加「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但對鄧演達高舉革命旗幟，反對國民黨法西斯政權的勇敢鬥爭精神和傑出人品是十分敬佩的。所以，她一直關心鄧演達的安全，早在鄧演達返國時就曾囑咐他要注意這個問題。當時，鄧演達卻慨然回答說：「我們鬥爭將是長期的、尖銳的，而又殘酷的。因為我過去毫不猶豫地向著腐惡鬥爭，比如頑固的封建勢力、機會主義以及反動行為，因而在軍政兩方面曾樹了不少的仇敵。但他們不能阻撓我追隨總理的步伐，我準備犧牲生命以赴，這次或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聚會。」¹⁵⁶他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這次宋慶齡回國後，得悉鄧演達組成「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出版《革命行動》報，進行反蔣活動頗有成績；尤其是《革命行動》報，揭露蔣介石的罪行影響極大，發行量

154 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

155 同上報，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156 宋慶齡：《紀念鄧演達》，載香港《華商報》，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由幾百份猛增到一萬多份，對南京的統治者是個重大的威脅。因此，蔣介石對鄧演達十分仇恨，視為眼中釘，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宋慶齡對此深為憂慮，再次提醒鄧演達說：「擇生¹⁵⁷，你寫文章宣傳革命要當心呀，汪精衛像條狗汪汪叫；你可冒犯了蔣介石，他會找你麻煩，你不可以暫時避開嗎？」鄧演達回答說：「夫人，你不要替我擔心。我現在工作正繁重離不開上海。為了安全，我從後門進出。不走前門吧！」¹⁵⁸

事情果然不出宋慶齡所料，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七日，鄧演達在上海愚園路愚園坊二十號對江西起義幹部訓練班的結業學員講課時，由於叛徒告密，不幸被捕。

鄧演達一直把宋慶齡當作「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發起人和精神領袖。他原準備在宋母葬禮完畢後，再親自向宋慶齡彙報國內形勢和工作，聽取意見。但不料竟在宋母葬禮前一天就被蔣介石逮捕了。

鄧演達被捕後，宋慶齡盡全力進行營救。她不得不違背自己一再宣稱的不求助反動當局的聲明，忍辱負重地親自到南京向蔣介石交涉。據當時陪宋慶齡活動的原孫中山衛士、中山陵護靈人員范良回憶，宋慶齡到南京後，拒絕住國民黨為她準備的官邸，而住在中山陵園舉行孫中山奉安大典籌備處簡陋的房子裡，由孫中山侍衛副官馬湘和范良等人陪同去找蔣介石要求釋放鄧演達。蔣介石大耍花招，把事情推在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身上。何應欽又推說

157 擇生是鄧演達的字。

158 范良：《對革命盡力竭意，救同志不遺餘力——我所知道的宋慶齡同志營救鄧演達的經過》，載《新華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

只知道鄧演達關在南京，但不知道具體地點。 159

經過多次周折，宋慶齡終於打聽到鄧演達被關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中。她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再次專程到了南京，並徑直找到中央軍人監獄的監獄長胡逸民。胡逸民與鄧演達在北伐戰爭時期共過事，私交很深，並很敬佩鄧演達的為人和才能，因此很同情他的不幸遭遇，曾向蔣介石求情釋放鄧演達未果。這次宋慶齡來，他當即陪同宋慶齡與鄧演達會見。宋慶齡與鄧演達見面後，兩人「揮淚而談，時而激昂陳詞，時而垂淚哭泣」，情景極為悲壯。

宋慶齡與鄧演達在監獄中秘密會見之事，當天就被獄中的特務密報給他們的上級。蔣介石的侍衛長王世和便急如星火地趕到胡逸民處，盛氣凌人地責問：「是讓你讓宋慶齡接見的？」胡逸民「嗯」了一聲。

「你真糊塗！上頭知道了，你如何吃罪得起？」

「這是孫總理夫人自己的要求，你敢不讓她見？」

蔣介石得悉宋慶齡插手鄧案，深恐夜長夢多，難以收拾，便密令戴笠「斬決報來」。¹⁶⁰恰在這時，由於蔣介石在「九一八」日本侵華後推行不抵抗政策，全國人民掀起了抗日民主運動高潮，兩廣軍閥乘機逼迫蔣介石下臺。蔣介石迫於形勢，決定以退為進，暫時下野再伺機復辟。他為掃除重新上臺的障礙，又密命陳立夫派李熙元軟化鄧演達，所提的釋放條件是：

159 范良：《對革命盡力竭意，救同志不遺餘力——我所知道的宋慶齡同志營救鄧演達的經過》，載《新華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

160 胡逸民：《我所知道的鄧演達被殺經過》，載《中華英烈》一九八八年第六期。

鄧演達在蔣介石下野期間，不再寫反蔣文章。鄧演達斷然拒絕：「我寫反蔣文章，不是我鄧演達要寫，是中國人民要我寫。」¹⁶¹至此，蔣介石考慮下野後，兩廣及其他派系都不可怕，只有鄧演達在其支柱黃埔系軍人中和國民黨左派人士中都深孚眾望，被捕後又堅強不屈，是動搖他的統治基礎的可怕因素，也是自己要捲土重來時的真正障礙，因此就下決心在下野之前殺害鄧演達。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深夜，他命其侍衛長王世和率領幾名衛士，秘密將鄧演達押至南京麒麟門外沙子崗，殘酷地殺害。「碧血飛花，荒野埋骨」，中國人民的一代英豪就這樣在蔣介石的屠刀下飲恨而亡，終年僅三十六歲。

鄧演達被害的消息傳出後，開始人們都不相信，還以為蔣介石下野，孫科任行政院長後，鄧演達即可獲釋。宋慶齡從何應欽的部屬處得知傳聞，就立刻又到南京，對蔣介石說：「現在國難當頭，你和鄧演達的矛盾，我來給你們調解。你把鄧演達叫來，我們三人當面談談。」蔣介石默然不語。宋慶齡又追問：「如果你覺得這裡談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見鄧演達，我先同他談談，然後再三人一起談。」蔣介石仍默然。最後，宋慶齡表示一定要見鄧演達，蔣介石才不得不說：「你已經見不到他了。」宋慶齡聽後勃然大怒，憤然一手把茶几掀翻，蔣介石便急急逃上樓去了。¹⁶²

161 史夫：《浩氣沖霄》，載《鄧演達》第一百四十一頁，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該文是作者根據羅任一、謝樹英、李世璋、朱蘊山等人的回憶及鄧演達被捕事件的檔案資料編寫的。

162 同上。

宋慶齡營救鄧演達雖然失敗了，但她對鄧演達深厚的感情和友誼卻永遠留在她的心中。此後，在鄧演達殉難十周年、三十周年和五十周年時，她都撰寫文章或題詞紀念。

鄧演達被害後不到一個月，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蔣介石在全國人民要求抗日民主聲浪的衝擊下，在國民黨內部派系矛盾的傾軋中，被迫下野。可是，自我標榜「民主政治」、「革命外交」的廣東派汪精衛集團上臺後不到三天，就製造了「一二·一七」珍珠橋慘案，殘酷屠殺各地到南京請願要求抗日的愛國學生。

鄧演達被害及「珍珠橋慘案」這連續發生的兩件事，給宋慶齡以極大的刺激，促使她的政治思想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她認識到國民黨的革命性已完全喪失，連鄧演達最後一次挽救國民黨的努力也歸於失敗，國民黨中像鄧演達那樣最後一點希望之火也被撲滅了。於是，她終於對國民黨完全徹底地絕望了。宋慶齡義憤填膺，奮筆疾書，寫出了一篇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檄——《宋慶齡之宣言》（即《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於十二月十九日發表。在宣言中，她無情地揭露蔣介石國民黨個人獨裁，爭權奪利，剝削群眾，殘害革命者的種種罪惡行徑，正式宣佈國民黨「滅亡」，實際上也宣佈了她正式退出國民黨。她說：「當作一個政治力量來說，國民黨已經不復存在了。這是一件無法掩蓋的事實。促成國民黨滅亡的，並不是黨外的反對者，而是黨內自己的領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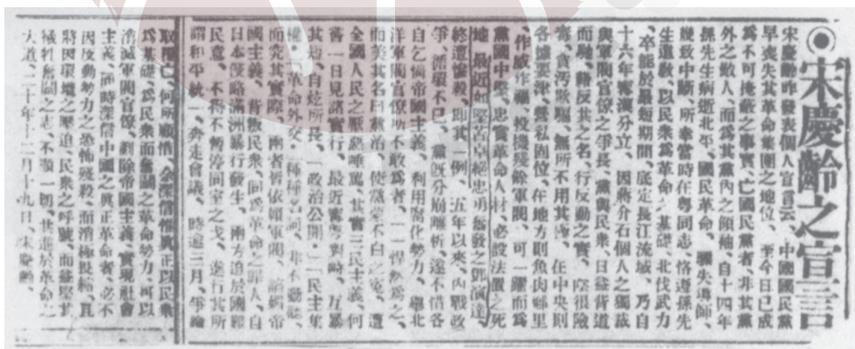
她從國民黨政策的背叛和成員的墮落兩方面，論證了這個結論。在政策上：「由於背棄了革命政策，各敵對的派系都向帝國主義者投降，並且不惜利用武力和最下流的手段。過去

北洋軍閥政客所不敢做的事，都在『黨治』的名義下毫無顧忌地做出了」；「廣州和南京這兩派都以軍閥為靠山，都在力爭他們的帝國主義主子的歡心，而且都背叛並屠殺中國人民大眾」。

在成員上：「在中央政府中，國民黨黨員力爭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鞏固他們的地位；在地方上，他們也同樣剝削群眾，以滿足個人的貪欲。他們和一個又一個的軍閥互相勾結，因而得以躍登黨和政府中的高位。但是，忠實的、真實的革命者卻被有意地百般拷打，以致於死。鄧演達的慘遭殺害就是最近的例子。」

於是，宋慶齡抨擊的目標不再局限於幾個國民黨領袖，而是整個國民黨，她說：「國民黨今天已名譽掃地，受到全國的厭棄和痛恨。」；「因此，我不得不率直地宣佈，既然組織國民黨的目的是以它為革命的機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創造起來的任務，我們對它的滅亡就不必惋惜。」

宣言中還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奮鬥目標：「我堅決地相信：只有以群眾為基礎並為群



為抗議蔣介石殺害鄧演達，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宋慶齡於上海《申報》通電聲討。

眾服務的革命，才能粉碎軍閥、政客의 權力，才能擺脫帝國主義的枷鎖，才能真正實行社會主義。」¹⁶³這清楚地表明宋慶齡在對國民黨絕望後跟隨共產黨走的政治立場。而且，這個宣言，同時也表明她與第三條道路劃清了界限。其實，這也是這個宣言產生的背景之一。

鄧演達被害消息證實後，「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頓時陷於群龍無首的境地。為此，他們一方面在十二月十六日發出《中央通告》，號召全黨「要在悲憤、慘痛中接受鄧同志的遺教，堅實我們的團結，鞏固我們的組織，整齊我們的步伐，一致攜手踏著先烈光榮血跡前進，剿滅我們的敵人，完成我們的神聖事業」。另一方面，在十二月十九日，謝樹英代表臨時行動委員會由楊杏佛陪同到上海莫里哀路中山故居拜見宋慶齡，請她出來領導他們的組織。謝樹英說：「我今天特來請示，今後的黨務怎麼辦？如果您能出來領導，那就好了。」宋慶齡沉默了半响後，淒然回答說：「我暫時不能出來！」至於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她仍然鼓勵他們說：「你們要繼續幹下去。」謝樹英提出：「請黃琪翔出來領導如何？」她沒有表示意見，只說：「你們商量去。」¹⁶⁴這顯然表明她不願干涉他們組織的内部事務。

《宋慶齡之宣言》的發表，石破天驚，沉重地打擊了蔣介石、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對臨時行動委員會的成員以極大的鼓勵與支持，但又保持了她在八月份宣佈的她與「第三黨」無關的政治立場。

163 宋慶齡：《為新中國而奮鬥》第二十五至二十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164 史夫：《浩氣沖霄》，載《鄧演達》第一百四十一頁，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儘管如此，國民黨各派系在爭權奪利的鬥爭中，仍想利用「孫夫人」的威望，為本派系的利益服務。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蔣介石下野後仍操縱實權進行搗亂，胡漢民、李宗仁等人加以抵制，致使汪精衛、孫科、陳銘樞等人組織的南京政府處於癱瘓狀態。當時，他們企圖求助於宋慶齡，在上海、南京報紙上製造輿論，說宋慶齡在上海與陳友仁、鄒魯晤談，候胡漢民入京，交李宗仁提案等，混淆視聽。宋慶齡立即於十二月三十日致函報館，予以闢謠，指出京滬各報所載這些消息「完全不確」。¹⁶⁵

從此，宋慶齡可以更加「無法無天」，全心全意地從中國人民的利益出發，把國內鬥爭與國際鬥爭結合起來，把公開鬥爭與秘密鬥爭結合起來，在廣闊的戰線上，向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發動攻擊，並且與共產黨相配合，結成一條隱蔽而特殊形式的革命統一戰線。

